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系列学术著作

伊沃尔加城址和墓地及相关 匈奴考古问题研究

潘玲 著



科学出版社
www.sciencep.com



知不足齋叢書
卷一百一十五

三



知不足齋叢書

伊沃尔加城址和墓地及相关 匈奴考古问题研究

潘 玲 著

科学出版社

北 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概括介绍了俄罗斯外贝加尔地区的两处重要匈奴遗存——伊沃尔加城址和墓地的考古发现,在充分的科学依据基础上,综合运用国内外考古资料判断伊沃尔加城址和墓地的主体年代在西汉中期至中晚期,并且分析了当地以西汉中期为主体和以东汉前期为主体的两个时期匈奴遗存的器物群的时代特征。在年代分析的基础上,对以伊沃尔加遗址群为代表的外贝加尔地区匈奴遗存进行文化因素分析,对南、北匈奴关系提出了新的认识,并且对中国境内的主要汉代匈奴遗存进行了具体分析。本书的附录部分对矩形动物纹青铜牌饰进行了类型学和年代学等方面的研究。

本书可供考古、历史、文物、博物馆工作者和高校历史、考古专业学生阅读、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伊沃尔加城址和墓地及相关匈奴考古问题研究 / 潘玲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ISBN 978-7-03-020191-1

I. 伊… II. 潘… III. ①匈奴—古城遗址(考古)—研究②匈奴—墓葬(考古)—研究 IV. K8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73611 号

责任编辑:宋小军 / 责任校对:李奕萱

责任印制:赵德静 / 封面设计:王 浩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7年12月第 一 版 开本:B5(720×1000)

2007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4 1/2 插页:3

印数:1—1 500 字数:276 000

定价:8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科印〉)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项目批准号:065A78001

该成果得到“吉林大学‘985工程’项目
——中国边疆史地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资助

序

中国史学界的匈奴研究,长期没能走出司马迁《匈奴列传》所造成的误区,一直把在中国北方长城地带春秋及春秋以前活动的人群,一概视为汉代匈奴的前身。所以,在考古界,把所谓的“鄂尔多斯青铜文化”当作“早期匈奴文化”的观点一度很流行。1992年我在呼和浩特的北方民族考古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发表了《关于中国的对匈奴族源的研究》一文,首次对《匈奴列传》造成的传统观念提出了质疑,在那篇文章的开头,我首先分析了《匈奴列传》把先秦北方诸族一体化而当作匈奴祖先的观点之所以形成的主要条件,然后从文化和人种上从当时已知的考古资料分析了长城地带先秦的人群是否真有一体性。努力尽可能揭示先秦时期长城地带既有共同因素又各有特点的多种文化,“不是同一族源的人群在文化上分化所致,而是不同族源和人群各自创造而又互相渗透的结果”,从而揭示《匈奴列传》的观点其实是一种历史的误会。

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该文提出了在研究匈奴族源问题时,“有必要把匈奴本体的族源问题从整个汉代匈奴的族源问题中区分出来。专门进行研究”。而且明确指出,考虑匈奴的族源,“其实质就是考虑冒顿赖以建立联盟的核心力量,究竟是具有什么样体质形态和文化特点的某一个或某几个较小族团(因为应该估计到在冒顿之前,匈奴也可能已经是包括几个族团的小型联盟)”。并声称:“我们有信心认为从考古学上研究匈奴本体的族源是可行的。”“我们已经比司马迁前进了一步,应该再跨进一大步。”

在这篇论文中,我已经根据一些线索指出,“我们有理由设想早期匈奴本体应属北亚蒙古人种”。接着在1996年出版的《金景芳九五诞辰纪念文集》中,我发表了一篇《戎狄非胡论》,对历来史家把我国北方先秦时代广布的“戎狄”和战国以后的“诸胡”(即匈奴、东胡等)混为一谈的重大历史误会,进一步专门作了论辩。除了论证“戎狄”经济类型不是游牧人、军事上不使用骑兵外,还着重指出:春秋晚期以前长城地带发现的绝大部分人类遗骸,颅骨鉴定均属东亚蒙古人种,而中国、蒙古和俄国西伯利亚考古发掘的汉代及汉代以后的匈奴、鲜卑、契丹颅骨鉴定,均属北亚蒙古人种。“因此,无法想像在春秋时代及更早的时期广布于中国北方地区的戎狄,能是战国以后的胡人的祖先。”

但是,我国田野考古中一直没有遇到战国到秦的明确的匈奴遗存,汉代匈奴遗存发现也较贫乏,始终限制着对匈奴考古研究的深入。

我因为在高中开始学习俄文,在吉林大学攻读甲骨文金文研究生时,就接触到《苏联考古学》第22期上发表的匈奴伊沃尔加古城的发掘报告。对其中出土的大型陶器、铁犁铧和有所谓“汉字”的砺石很感兴趣。1973年回吉林大学执教,1974年讲西伯利亚考古课之初,就编译了一部分伊沃尔加古城的考古资料,作为专题讨论之一的参考教材。直到2001年我到美国匹兹堡大学讲学时,在林嘉琳教授处才看到1995年出版的《伊沃尔加城》、1996年出版的《伊沃尔加墓地》、和1998年出版的《德列斯图依墓地》等几本大型考古报告。当时林嘉琳教授已经热情相赠很多有关游牧文化的书和教学参考资料。不好意思麻烦她再复印更多的资料,所以只复印了《伊沃尔加城》这本报告带回来。

那时,我的博士生潘玲正在找合适的论文题目。我想要能发挥她会一点俄文的特长,正可以做伊沃尔加古城的专题研究。虽然在中国要想全面了解国外匈奴考古的资料很不容易做到,但如果深入分析一批兼有居址和墓葬的完整的资料,而又有一定面上的资料可资比照,也许是可以有一些突破的。所谓面上的资料,除了梅原末治的《蒙古诺音乌拉发现的遗物》、鲁金科的《匈奴文化和诺音乌拉古墓》和米尼亚耶夫的《德列斯图依墓地》外,幸亏有北京大学晁华山教授的硕士生单月英在2001年5月刚完成了《匈奴墓葬初步研究》一文。据说她在写这篇论文时曾到我北大的老同学乌恩岳斯图处请教,而乌恩将他所收集的全部匈奴考古资料(包括一部分他的译稿)倾囊相授。而且她还通过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官员请俄罗斯学者帮助收集复印了有关匈奴考古的俄文考古报告。潘玲和这位单月英联系后,得到她无私的帮助。这样,至少在大面上不会有重大的遗漏。

我起初对潘玲的研究能力不敢估计过高。私下的想法是,如果分析研究不出什么有价值的新见解,把这一批重要的考古资料原原本本介绍给现在很少有人懂俄文的中国考古界,也就不枉费一番工夫了。但她以过人的毅力,啃完了几大本俄文考古报告,俄文也有了长足的进步;而且通过钻研伊沃尔加的考古资料,获得了一系列原创性的学术成果。

第一,综合中、蒙、俄三方面的考古资料,首次有科学根据地把匈奴遗存分为西汉和东汉两大期别;并确定了这两期匈奴遗存的器类差别和同一器类的数量和形态上的差别,从而更精确地确定了伊沃尔加遗址的年代。

第二,在分析伊沃尔加城址和墓葬的文化因素时,详细分析为外贝加尔当地固有的因素、汉代匈奴共有的因素、汉文化的因素、中国北方长城地带的因素、叶尼塞河中游的因素、阿尔泰地区等地的因素,尤其是从陶器的器形和纹饰、墓葬的形制、骨镞和骨弓弭的种类和形态三个方面,论证了西汉的匈奴文化遗存和石板墓文化的历史联系,为从文化上探索匈奴本体的族源提出了重要线索。

第三,在通盘分析已发现的匈奴墓葬的基础上,论证了伊沃尔加墓地是等级最低的,而且社会地位差别不明显,这和城中房址的情况是相应的,从而判定城中居

民是以地缘组织住在一起的农业和手工业者,这样的“地缘性的生产聚落”,“只是匈奴游牧社会的一个特殊的有机部分,匈奴的主体人群并非如此”。

第四,对中国考古学界流行的南、北匈奴在体质类型上和文化传统有差异的观点,从文献、人种、考古遗存三个方面提出了颇有根据的质疑。

第五,从对伊沃尔加遗址群为主的苏、蒙匈奴遗存的認識出发,反观我国的匈奴遗存和含匈奴文化因素的遗存,也有不少新的见解。其中特别有价值的是:其一,把我过去论文中定为西汉早期的楼烦白羊王部族的西沟畔 M4,改定为东汉中南期的南匈奴的墓葬;其二,把过去被误认为是鲜卑遗存的完工墓地,改定为主要含有汉书二期文化和西汉匈奴文化的墓葬。

潘玲作为一个研究匈奴考古的新兵,通过艰辛的努力,在不到两年的时间能有这样的成绩,我是很感动的。她的论文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刘庆柱和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吴荣曾为评阅人,并邀请考古所前副所长、德国科学院通讯院士乌恩岳斯图、考古所副所长王巍、国家博物馆副馆长朱凤瀚、四川大学考古系教授张勋燎、宁夏考古所所长罗丰、吉林省考古所前所长方起东等国内知名专家做同行评议。得到这么多的专家学者的指教,在她是一次难得的学习和提高自己的机会。

潘玲的论文是2003年在她母亲有病,并在她要一次次回佳木斯照顾住院的母亲的情况下完成的。所以定稿仍有很多地方很粗糙,尚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在她取得学位后,忙于承担带本科生考古实习,担任“秦汉考古”的备课和讲课任务,并且根据考古学系的需要,通过她自己的努力,新创建了一门“蒙古考古”的选修课。这都需要花很多工夫。因此,博士论文的进一步加工、交付出版的事,未能很快完成,直到去年年底才把改定的书稿送到我手。我因为事忙,直到今年2月份才抽空细细看了改定稿,又一次很感动。这一稿和原稿有颇大的不同,一是论点的论证更加突出重点,文字更加洗炼了。特别是原稿中的第六章“从伊沃尔加城看匈奴的起源问题”和第七章“伊沃尔加城的居民组成及其经济生活和社会组成”,伊沃尔加墓地的头骨保存情况较差,至今未见系统研究报告,研究者的意见也不一致,故对该城居民的人种颇难有肯定的结论。且两章所讨论的问题也比较多,结构松散。她毅然舍弃了原稿中说不清、论证难以到位的部分,把最有把握的部分重新组织,改写成“伊沃尔加城的性质和居民的组成”一章,表明作者在学术修养上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二是书稿中对中国秦汉时期考古遗存的分析更加细致,因此把博士论文原稿中所定“德列斯图依类型”墓葬和“苏吉类型”墓葬的器物群“分别是西汉和东汉两个不同时期的”,进一步精确化为“分别是以西汉中期为主和以东汉前期为主”,“其中伊里莫瓦墓地和苏吉墓地有些墓葬可能是处于两者过渡时期,在‘苏吉类型’中年代偏早”。而在分析伊沃尔加遗址的文化因素时,把“汉文化因素”改成“来自中国北方黄河流域地区的文化因素”,她正确指出,汉文化是到西汉中期才融

合多种因素形成的。而匈奴文化吸收的来自中国北方地区的文化因素,有很多实际是来自秦文化的。匈奴在战国晚期到西汉初期所吸收的中原文化的因素,和匈奴固有的传统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与后形成的汉文化有别的匈奴文化,这种观点无疑是新颖的,也是符合客观实际的。这是潘玲近年来秦汉考古功底加深的反映。

我高兴的是,她没有在博士学位上止步不前,而是继续一步一步踏踏实实地前进。从潘玲身上,可以看到,掌握一门到两门外语的中国青年考古学者在世界考古范围内的确是大有可为的。俄、蒙考古学者之所以长期不能在匈奴考古遗存的分期断代和匈奴文化的构成上有重要的突破,根本原因是不懂中文,因而无法对秦汉考古遗存有较深入的了解。所以像潘玲这样的新兵,就有了很广阔的用武之地。希望有更多的有志者,来开拓这片新天地。

关于匈奴本体的文化上的起源,潘玲这篇论文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线索,而人种上的起源,在近年来吉林大学的陈靓和张全超的博士论文中也有重大的突破。现在大概可以确认,匈奴的本体是在蒙古高原上形成的北亚蒙古人种古蒙古高原类型,以其短颅而有别于相对长颅的古西伯利亚类型。这种体质的游牧人在春秋晚期南下到鄂尔多斯地区,才掀开了北方长城地带的历史新篇章。

林 沄

2006年4月4日

于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目 录

序	林沅(i)
第一章 绪论	(1)
一、匈奴考古发现简史	(3)
二、匈奴考古研究简史	(5)
三、伊沃尔加城和墓地在匈奴考古研究中的特殊地位	(8)
第二章 伊沃尔加城址介绍	(14)
一、地理环境及城址概况	(14)
二、遗迹	(14)
三、遗物	(24)
第三章 伊沃尔加墓地介绍	(42)
一、墓地概况	(42)
二、墓葬结构和葬俗	(42)
三、随葬器物简介	(52)
第四章 伊沃尔加城址和墓地的年代	(63)
一、俄罗斯学者的主要观点及评价	(63)
二、伊沃尔加城和墓地年代的判断	(65)
三、外贝加尔和蒙古匈奴遗存的年代以及伊沃尔加遗址群的年代下限	(72)
第五章 伊沃尔加城址和墓地文化因素分析	(89)
一、来自中国北方黄河流域地区的文化因素	(89)
二、中国北方长城地带的文化因素	(103)
三、外贝加尔当地的文化因素	(105)
四、来自南西伯利亚叶尼塞河中游地区的文化因素	(109)
五、南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等地的斯基泰时期文化因素	(110)
六、各地匈奴遗存文化因素构成的不平衡性	(111)
第六章 伊沃尔加城的性质和居民的组成	(120)
一、伊沃尔加城的性质分析	(120)
二、伊沃尔加城居民的组成	(121)

第七章 对中国汉代匈奴考古问题的新认识·····	(130)
一、北匈奴和南匈奴关系的探讨·····	(130)
二、对我国境内的主要汉代匈奴遗存的分析·····	(135)
第八章 结语·····	(159)
附录 矩形动物纹牌饰的相关问题研究·····	(161)
一、分类·····	(161)
二、年代和分布区域·····	(174)
三、纹饰的演变和源流·····	(176)
四、功能和用法的差别·····	(183)
Abstract·····	(195)
后记·····	(218)

第一章 绪 论

匈奴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北方民族之一，它于战国晚期开始在中国长城地带崛起，成为北方诸国的强敌。秦末和西汉前期，匈奴在与中原政权的军事对峙过程中长期处于优势，西汉王朝被迫采用和亲的方式缓解匈奴对北方边境的侵扰。在匈奴强盛时期，控制包括南起阴山、北抵贝加尔湖、东起辽河、西逾帕米尔高原的广大地域。西汉中期以后，在汉朝的大规模军事打击下，匈奴日渐分裂和衰落。东汉前中期南匈奴南下鄂尔多斯高原臣服汉朝；北匈奴西迁，其后裔在此后几百年间不断向西征服，直达地中海西岸，引起欧洲大陆居民的大范围迁移，最终导致这里的野蛮民族跨入文明社会建立中世纪的国家。因此匈奴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都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匈奴史的研究也长期引起中外学术界的关注。

匈奴没有自己的文字，关于他们的历史主要见于中文的历史文献。两汉时期关于匈奴历史的记载见于《史记》、《汉书》、《后汉书》，这是站在中原王朝史官的角度记述外族的历史，记载侧重于匈奴与中原王朝的军事政治关系的记录，对它的文化习俗、社会生活等方面的记载较简略。20 世纪初，国内学者开始注重匈奴史的研究，基本上以上述文献资料为基础研究匈奴的族源和族属、社会制度等方面内容。因受文献记载的局限，这种研究往往有很多问题难以深入探讨。

18 世纪以后，随着中国历史文献被欧洲学者翻译发表，匈奴史的研究开始在欧洲兴起，此后国外学者开始从比较语言学的角度研究匈奴的族源和族属，所依据的匈奴语言主要是出现于中国文献的几十个词汇和短语。由于比较语言学者个人的研究角度不同、可比较的匈奴语言有限，因而得出匈奴属于蒙古族、突厥族、斯拉夫族等不同的结论。可见从有限的语言学材料出发，亦难以深入研究匈奴的族源和族属问题。

因此要了解匈奴是怎样的民族、匈奴的人种成分及其社会经济文化等情况必须主要依靠考古发掘资料。战国晚期以后一直到东汉中期，匈奴曾多次深入到中国北方长城地带活动，与中国北方地区居民有较多接触，接受较多中原文化的影响，这使匈奴考古与中国考古，尤其是秦汉考古关系密切。另一方面，匈奴遗存主体分布在俄罗斯外贝加尔地区和蒙古国，中国境内目前发现的匈奴遗存主要是级别不高的墓葬，数量也较外贝加尔和蒙古的少很多（图 1-1）。因此中国学者进行匈奴考古研究，必须以国外的考古材料为基础。上述匈奴的历史和考古遗存状况，决定了必须综合运用中、外的考古材料，才能使匈奴考古研究更加深入。本书即试图在这方面作一些有益的探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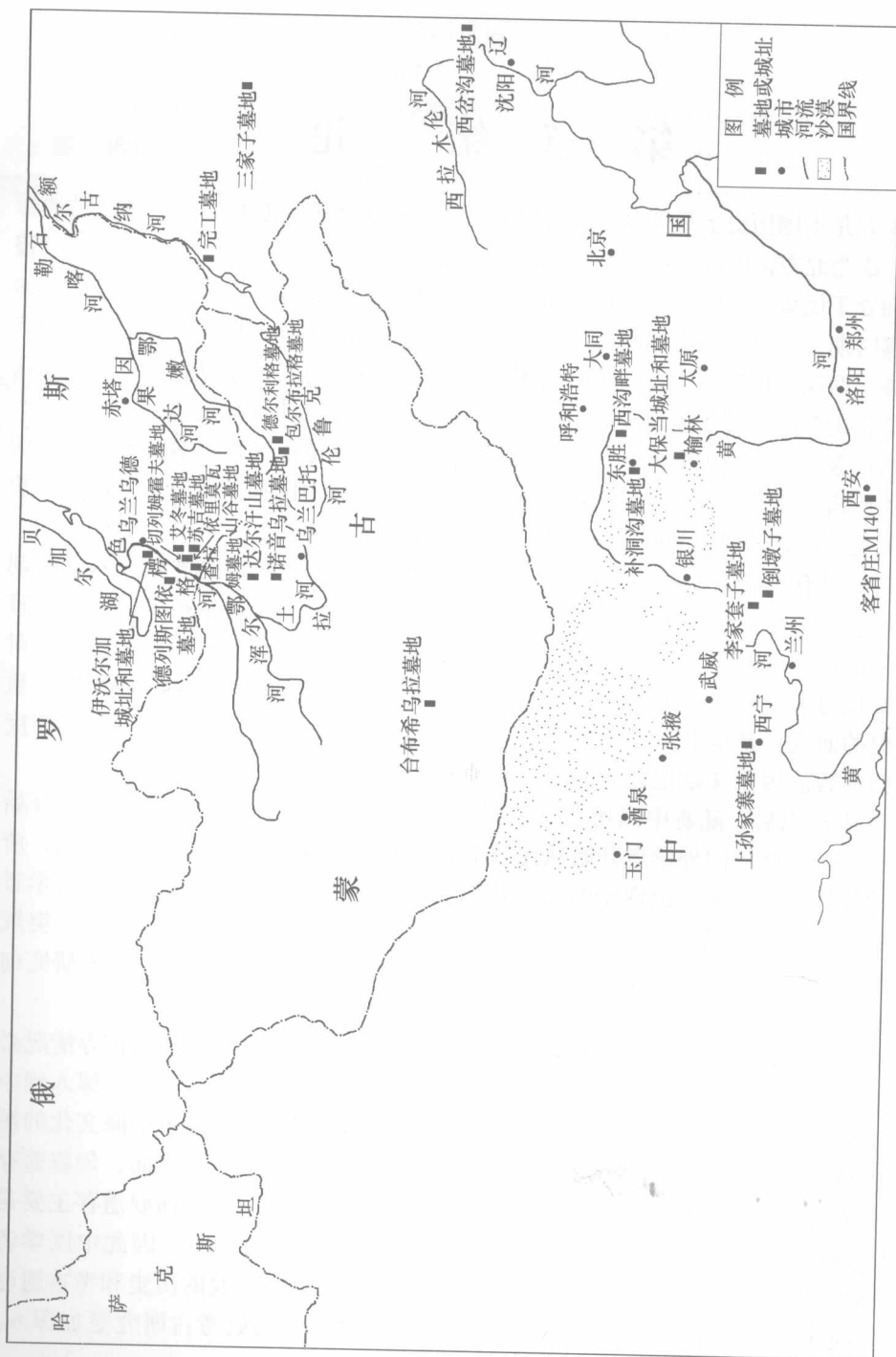


图 1-1 汉代主要匈奴墓地和城址以及含有匈奴文化因素的墓葬分布图

一、匈奴考古发现简史

匈奴的考古遗存于 19 世纪末最早发现于俄罗斯的外贝加尔地区,是恰克图市附近的医生达里克-格林采维奇在贝加尔地区西南发现的。他在那里发掘了 100 多座墓葬,其中包括伊里莫瓦谷地的 33 座和德列斯图依基地的 26 座匈奴墓葬,这些发掘发表的材料都非常简略^[1]。

1912 年采金者巴洛德勒在乌兰巴托西北的诺音乌拉山首次偶然发现匈奴墓葬,并向俄罗斯地理协会东方-西伯利亚分会写信汇报他的发现^[2]。虽然当时并没有辨认出墓葬所出遗物是匈奴的,但是还是引起该协会的高度重视,并且筹划进行发掘,后来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未能进行。1924~1925 年,苏联考古学家科斯洛夫主持的研究小组在蒙古诺因乌拉山发掘了 6 座大的和 4 座小的墓葬,其中除了捷波罗乌霍夫发掘的一座是用“揭露的仔细研究的方法”发掘的以外,其余的都是在封土顶部挖相当窄的“竖井”直接进入墓室,因此对墓葬结构了解得不太清楚,但是可以发现墓的基本结构是两重椁,椁内有棺,随葬品丰富豪华。其中的 6 号墓出有“建平五年”等字款的漆耳杯,据此判定这里是公元前后的匈奴高级贵族墓地。蒙古诺音乌拉汉代匈奴墓地的重要发现引起苏联学术界的重视,也使人们认识到应该重新评价达里克-格林采维奇在外贝加尔发现的同类遗存,并且迫切需要补充新的资料。因此,1928 年的在索斯诺夫斯基主持下的布里亚特-蒙古考察队将寻找匈奴遗存作为首要任务,该队在伊里莫瓦谷地发掘 11 座匈奴墓葬,最重要的是在伊沃尔加河下游发现的匈奴时期居住址(即伊沃尔加城)并对其作初步的考察^[3]。

1949 年奥克拉德尼克夫主持的第二个布里亚特-蒙古考察队重新发掘伊沃尔加城^[4],1956 年开始发掘城址附近的同时期的伊沃尔加墓地。该考察队还在 1957 年发掘距伊里莫瓦山谷不远的切列姆霍夫墓地^[5]。

1965~1972 年,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布里亚特分所在克诺瓦洛夫的主持下在南布里亚特进行田野考察。除了对遗存的调查和测绘,他们还在切列姆霍夫墓地、伊里莫瓦山谷和德列斯图依基地进行定点发掘,采用全面揭露发掘区域的方法,同时进行详细的文字记录和绘图,因此这些发掘有较高的科学价值^[6]。

20 世纪 60~90 年代,苏联考古学家对外贝加尔的三处重要匈奴遗存——伊沃尔加城和墓地、德列斯图依基地继续进行发掘。伊沃尔加城总发掘面积 7000 平方米,揭露了城址的约 20% 的面积,1995 年《伊沃尔加城》较全面地发表该城多年的发掘成果^[7]。伊沃尔加墓地和德列斯图依基地均采用完全揭露的发掘方法,1996 年《伊沃尔加墓地》完全发表该墓地 216 座墓葬的发掘材料^[8],1998 年《德列斯图依基地》完全发表历年发掘的 130 座墓葬的发掘材料^[9]。

除了外贝加尔地区,在俄罗斯的阿尔泰和图瓦地区以及南西伯利亚的叶尼塞河中游一带还存在一些与当地土著文化共存的含有匈奴文化因素的遗存,这与匈奴向西的军事扩张有关。在阿尔泰地区这类遗存发现的数量较少而且材料零星^[10],图瓦地区的艾尔米雷格墓地和巴依-达拉二号墓地属于此类遗存^[11]。在南西伯利亚叶尼塞河中游,在年代相当于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的塔加尔文化捷西期的遗存中较多的见到匈奴风格的带饰等装饰品,其中以1966年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乌茹尔地区发现的克索格里宝藏的最为集中^[12]。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苏联学者一直是蒙古匈奴考古工作的主要参加者,20世纪50年代以后蒙古的匈奴考古工作范围更加扩大,蒙古国内的考古学者开始加入这一行列。1954年道尔吉苏荣在诺音乌拉山发掘11座匈奴墓葬,1955年在这里发掘2座大型墓葬、9个祭坛和4座普通墓葬。1956、1957年他在呼尼河谷发现近300座墓葬,在高勒毛都地方调查了26座。60年代蒙古考古学者与匈牙利学者联合在乌兰巴托附近的诺音乌拉以及呼尼河流域等地发掘匈奴墓葬。以上发掘成果用新蒙文在乌兰巴托发表,道尔吉苏荣的《北匈奴》对此也有详细的介绍^[13]。1969年苏联和蒙古联合在蒙古的达尔汗山发掘6座匈奴墓葬^[14],同年在三河流域考察的考古分队发现匈奴时期的大墓地,1971年蒙古和匈牙利的考古学家在这里发掘9座墓葬^[15]。70年代蒙古和匈牙利学者在台布希乌拉、那伊玛多尔格墓地、努赫金墓地、昌德曼墓地、杜尔干谷地等地发掘,这些发掘材料在策温道尔吉的《匈奴考古新材料》一文有详细的介绍^[16]。

据策温道尔吉1985年的统计,当时蒙古已发现匈奴墓葬897座(他认为有的墓地统计数字不详细,实际数量在1000座以上),发掘115座^[17]。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法国、韩国、日本等国学者开始与蒙古学者合作,参与蒙古的匈奴遗存的发掘和调查,其中多数调查和发掘成果同时以新蒙文和其他合作国家的文字发表^[18]。

蒙古的匈奴考古遗存丰富,但是缺少像外贝加尔的伊沃尔加墓地和德列斯图依墓地那样的对一个墓地的完整发掘和研究。除了俄罗斯和日本学者发表的少量介绍诺音乌拉匈奴墓葬的专著以外,对蒙古匈奴遗存的发现和研究的论文很多都以新蒙文和其他国家的文字发表,这给中国学者进行蒙古匈奴考古研究带来一些语言上的困难。

中国的匈奴考古发掘工作开展得比较晚,曾经有学者将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内蒙古长城地带发掘的一些春秋战国时期北方民族的墓葬认定为早期匈奴的遗存。但是早已有学者指出,很难确定上述墓葬中哪些与匈奴本体有直接的关系^[19]。中国境内的匈奴墓葬遗存主要是七八十年代发现的。1979年内蒙古考古所等单位在当时的伊克昭盟发掘了西沟畔墓地,1980年发掘补洞沟墓地^[20]。1983年宁夏考古所等单位在同心县发掘李家套子墓地^[21],1983年发掘倒墩子墓

地^[22]。上述墓地年代在两汉时期,墓葬数量较少,其中墓葬最多的倒墩子墓地也只有 27 座墓葬。1977 年青海考古所在大通县上孙家寨发掘 170 座汉晋时期的墓葬,墓葬形制和随葬品与同时期汉墓非常相似,其中一座东汉晚期的墓葬中发现有“匈奴归义亲汉长”印文的铜印,说明该墓地埋葬有汉化程度比较重的东汉时期归降的匈奴部族成员^[23]。1996 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发掘神木县大保当城址和附近的画像石墓地,城址和墓葬中都发现一些有明显匈奴文化特征的器物^[24]。中国境内含有匈奴文化因素的墓葬发现得比较早,过去曾经把它们看作完全是匈奴的或者鲜卑的遗存。这些含有匈奴文化因素的墓葬遗存中较重要的有 1956 年发掘清理的辽宁省西丰西岔沟墓地^[25]、1961 年和 1963 年发掘清理的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完工墓地^[26]、1981 年清理的黑龙江省齐齐哈尔三家子墓地^[27]。

二、匈奴考古研究简史

(一) 国外匈奴考古研究简史

匈奴考古遗存最早的研究者也是它的最早发现者达里克-格林采维奇,1908 年他根据自己在外贝加尔的发现,尝试将匈奴墓葬分为“埋在椁内”和“埋在棺内”的两种。他认为埋在椁内的与匈奴有关,而埋在棺内的与吉尔吉斯或通古斯有关,两者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后来他又认为后者也是匈奴的^[28]。1925 年蒙古诺音乌拉墓地发掘者之一捷波罗乌霍夫把当时所有在蒙古、外贝加尔西南、米努辛斯克地区和阿尔泰地区发现的相类似遗存归属为同一个文化,即匈奴文化^[29]。

1934~1946 年,索斯诺夫斯基在一系列论著中指出外贝加尔和蒙古发现的是同样的匈奴文化遗存,并注意到达里克-格林采维奇分出的“埋在椁里”和“埋在棺里”的两种墓葬在文化上的一致性,他相应地将这两种墓葬分别命名为德列斯图依型和苏吉型两个类型,同属于匈奴文化,认为前者的年代为公元前 1 世纪,后者为公元 1 世纪^[30]。在他的手稿《外贝加尔的匈奴》中收集了当时的匈奴考古材料并使其系统化。索斯诺夫斯基的研究开始了建立在充分的考古材料基础上的匈奴问题研究的新阶段。

二战以后匈奴考古发现的范围更加扩大,由于新材料的积累,使学术界认识到重新系统分析匈奴的文献材料和考古材料的迫切性,相应的 20 世纪 50 年代末至 60 年代初,在苏联和蒙古发表了一批专门研究匈奴历史的专著。1961 年蒙古学者道尔吉苏荣的《北匈奴》对在蒙古的匈奴考古资料第一次作汇总,同时结合当时外贝加尔的相关材料,将全部匈奴遗存的年代断代为公元前 2 世纪至公元前 1 世纪。他认为匈奴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过着定居的生活,农业起一定的辅助

作用,匈奴与当地先前的石板墓文化有亲缘关系^[31]。1962年鲁金科的专著《匈奴文化与诺音乌拉古塚》发表,他结合外贝加尔的发现,第一次对克兹洛夫考察队在诺音乌拉山发现的匈奴墓葬作全面的文字、图形介绍和分析,详细地分析和描述了匈奴的物质文化^[32]。1976年克诺瓦洛夫发表专著《外贝加尔的匈奴》,在伊里莫瓦山谷、德列斯图依和切列姆霍夫墓地新的考古发现的基础上,他总结了当时对外贝加尔匈奴墓葬遗存的研究成果,纠正了过去达里克-格林采维奇对墓葬结构的一些错误认识。在该专著中作者仍然坚持将匈奴墓葬分为德列斯图依和苏吉两个类型,认为两者的随葬品除在某些数量比例和种类上有一些差别外,没有本质的区别。对当时考古新发现反映出的匈奴墓葬的多样性的原因,他解释是匈奴内部的社会关系和可能的民族关系复杂性的反映,认为其中还有可能是年代早晚的差别,但是未作任何进一步的具体分析^[33]。

六七十年代,寇兹拉舍夫在他的一系列文章中发展并精确了索斯诺夫斯基关于匈奴墓葬两个类型的划分理论。他将匈奴墓葬遗存分为两个发展阶段:德列斯图依阶段,年代为公元前2世纪~前1世纪;苏吉阶段,年代为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34]。

将匈奴遗存划分为以上两类型或阶段的观点在俄罗斯考古学界曾经十分流行。一直到1992年,在俄罗斯的考古学总结性著作《斯基泰-萨尔马特时期苏联亚洲部分的草原地带》的“外贝加尔的匈奴”部分中,仍将伊沃尔加城和墓地、德列斯图依墓地和达尔汗墓地划分为德列斯图依型遗存,年代为公元前2世纪~前1世纪;将苏吉、伊里莫瓦、切列姆霍夫、诺音乌拉等墓地划分为苏吉型的,年代为公元前1世纪~公元1世纪。但是认为苏吉型的遗存早在公元前3世纪已在图瓦地区存在,只不过在公元前1世纪~公元1世纪苏吉型墓地成为匈奴遗存的主要形式^[35]。

对上述匈奴遗存两种类型划分理论持反对意见者以达维多娃和米尼亚耶夫为代表,他们分别是伊沃尔加城址和墓地以及德列斯图依墓地发掘的主持者。达维多娃认为匈奴文化是一致的,匈奴遗存间的联系在各方面都能反映出来,它们应该有一致的年代,即公元前2世纪~公元1世纪。她曾经认为对匈奴遗存分类的基础应该是经济形态,根据她的分类,以伊沃尔加城为代表的定居的匈奴村落在外贝加尔的出现时间要早于作为匈奴主体的游牧集团在此的出现时间^[36]。在《伊沃尔加墓地》中,达维多娃虽然不再提以经济形态为分类基础的观点,但仍认为以土坑墓为主体的伊沃尔加墓地与其他有墓上石堆和木椁的匈奴墓地之间的差别,是匈奴定居部分与游牧部分的本质区别的反映,不是墓葬年代和级别差别的反映^[37]。米尼亚耶夫认为外贝加尔和蒙古的匈奴遗存总体上属于同一时期,并且能够断代为公元前2世纪~公元1世纪。现有的材料不能在这一时期内分出任何一个年代阶段^[38]。两位学者之所以反对德列斯图依和苏吉两个类型或阶段